

# AIGC赋能地方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的实践路径研究

——以江宁区红色文化田野调查为例

杨育涛

南京传媒学院 江苏南京 211172

**摘要：**在数字媒介深度融合背景下，AIGC技术正在改变红色文化的叙述方式以及呈现形式。而地方红色文化是革命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化进程以及媒介转型过程中面临着大量的历史影像丢失、口述史流失以及年轻人缺乏兴趣等问题。根据对南京市江宁区的田野调查，可以看出传统的线下展览加单方面讲解的方式已经难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因此本文提出利用AIGC技术进行历史影像修复、多模态叙事重建以及沉浸式体验革新来使红色文化由“空间记忆”转变为“数字记忆”。也要注意不能忽视技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过度追求娱乐化导致的内容失真问题等。要在技术进步的同时兼顾道德约束，使红色文化能够更好地在网络空间里得到发扬光大。

**关键词：**AIGC；红色文化传播；数字叙事；多模态传播；数字记忆转型

## 一、数字媒介转型与红色文化传播的结构性变革

在数字媒介高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传播结构以及意义生产的方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如喻国明所说，数字媒介技术不是一种简单的工具的进步或更新换代，而是一种重新定义了整个传播方式以及权力关系的重要力量，它使得传播由原来的“中心化灌输”转变为现在的“去中心化协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红色文化单一的线性的叙述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当今各种各样的人群对于媒介使用的习惯。

过去红色文化的传播大多依赖纪念馆里的讲解、展板展示以及纸质史料等不同载体，它的好处在于权威性和系统性，但在数字媒介占主导的传播生态中，局限性就变得很明显。线性叙事和单向传播的模式，已经不太容易适应现在人群的碎片化阅读和即时互动的媒介使用习惯，宏大叙事结构虽然具备历史深度，但往往缺少个人情感层面的内容，不容易让人产生情境沉浸和情感共鸣。传统表达形式在视觉上多数是静态的，缺乏动态化的呈现和多种感官的刺激，在信息流的环境里很难持续

吸引人们的注意。

随着时代发展，国家层面提出的文化数字化战略为红色文化数字化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引。《“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文化资源数字化转化、数字化传播，为红色文化数字化发展提供了政策遵循。强调要借助数字技术来实现文化资源的整合、保护和传播升级，AIGC的出现，给红色文化传播的创新带来了新的技术工具。AIGC通过深度学习模型能够完成图像生成、语音合成和视频创作，让历史记忆可以在多模态环境中重新呈现，不过技术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它在参与文化生产过程里，一定会影响历史叙事的结构和意义的建构，彭兰进一步提出，智能传播时代的内容生产已进入“人机协同”阶段，算法不仅参与信息分发，也深度介入内容生成与价值框架建构。这意味着AIGC技术在红色文化再生产中的运用，不仅影响表达形态，更可能重塑叙事结构与价值呈现方式。所以在数字媒介转型的背景下引入AIGC来赋能红色文化传播，这既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涉及文化价值和历史真实性的问题，所以本文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语境里展开研究的。

## 二、江宁区红色文化资源现状与田野调查基础

根据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发布的《2024年江宁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江宁区常住人口超过150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200亿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提升，区域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这一城市化与数字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为红色

**基金项目：**南京传媒学院2025年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AIGC赋能江宁区红色文化田野调查”（项目编号：S202513687025）资助。

**作者简介：**杨育涛（2005.2-），男，汉族，山西晋中人，南京传媒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数字传播与红色文化数字化研究。

文化的数字转型提供了现实基础。然而，在高速发展的城市空间结构中，部分革命遗址面临“功能边缘化”问题，红色文化资源在现代城市叙事中呈现出传播能见度不足的现象。目前江宁区登记在册的革命遗址、烈士纪念馆设施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计30余处，主要分布于谷里、汤山、横溪等区域。从传播结构来看，线下参观仍是主要方式，线上数字传播体系尚未形成系统，同时红色文化传播正在完成从“空间记忆”向“数字记忆”的转型。

江宁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战略地位重要，是南京地区革命活动的一个主要区域，该地区现在存在大量革命遗址、纪念场所和烈士陵园等这样的红色资源，它们承载着相当丰富的革命历史记忆。然而在实际传播过程中，我们在通过一些活动发现，江宁的红色文化有着一些问题，比如资源整合做得不足，表达形式也比较单一。历史资料分布分散，缺乏统一的数字化管理平台，不仅影响资源利用效率，也限制了系统性红色文化传播。同时部分革命事件缺乏影像资料，仅靠文字记载导致视觉传播基础薄弱。导致现有传播形式主要依赖线下参观和讲解，线上传播体系建设不足，难以形成持续的数字传播矩阵。

2025年6月—2026年3月团队开展了田野调查，在这期间，团队成员多次跑到谷里、汤山、以及江宁烈士陵园这些地方，进行民间访谈，还查阅了地方党史文献、烈士家书和历史报刊，同时，对附近的一些村民进行了问卷调查，田野调查结束后我们迅速对收集到的资料——革命人物和事件做了时间轴的梳理和结构化整理。

田野调查活动不仅为技术生成提供了真实性基础，也在方法论上避免了技术脱离历史语境的风险。通过实地调查，我们对史料内容进行了多重验证，确保后续生成内容在历史准确性上无误。

### 三、AIGC赋能路径构建与沉浸传播实践

团队成员基于历史资料和实地调查走访，梳理出“史料整合—智能方式生成内容—沉浸式表达—传播转化”这样的一个流程。我们将红色文化的AIGC赋能遵循这一核心路径，实现技术赋能与文化价值的协同。

在整合历史资料这个环节里，我们借助档案里的材料把信息挑选出来加以处理，为后面的资料整合分析做准备；在智能生成阶段，我们根据史料里头的描述来给出提示语，借助图像生成模型，对革命人物形象和战斗场景做可视化重建。对历史老照片也做了清晰化修复

和风格增强，我们不仅恢复了旧照片，也让照片更贴近当代视觉传播的标准；在沉浸表达环节，项目借助不同资源方式，制作出让人有沉浸感的红色文化AIGC短视频作品；在传播转化的阶段，我们配合了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效果加以评估对比，从数据上来看，大家更喜欢AI影像视频，从情感认同的层面，都明显比传统的图文内容高出不少，同时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提到，这种沉浸式的视觉表达方式，让他们对革命历史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从实际结果来看，AIGC不光让内容生产的效率变高了，还在传播心理这个层面加强了人们对历史情境的感知，使得技术带来的赋能和文化价值之间能够协同起来。

### 四、沉浸传播与青年认同机制的建构

从传播学这个角度来加以审视的话，沉浸传播其实是一种借助多种媒介融合在一块儿的方式，来让人能够参与到具体情境里的传播形态。AIGC生成的内容在视觉、听觉还有叙事结构这几个方面都融合得挺好，这就让红色文化的传播从过去那种“知识灌输”的做法，慢慢转变成了一种“情境体验”的感觉。

本项研究里，到了传播测试这一个环节里，我们借助调查问卷和访谈的方式，收集了百余人不同年龄段群体给出的反馈。对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内容在三个维度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第一个方面，是认知维度。受访的人对于历史事件中的时间点和相关人物，他们记起来的准确程度，明显比以前高了不少。他们从以前的毫无概念到看完以后的知道大概故事的转变明显改变很多。

第二个方面，是情感维度。很多人在访问中提到，他们看完以后心里对历史连接有了更强烈的情感，爱国情怀在心中熊熊燃起。

第三个方面，是行为维度。有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提到，他们看完以后自己也愿意亲身走到线下的遗址里面去参观。这个维度的改变，极大的体现了我们这个项目的的作用，我们不仅要宣传故事而且也要让大家多去去现实体验一番，带到当地的红色文化经济发展。

### 五、制度规范与技术伦理框架构建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应用于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必须以严格的制度规范与明确的伦理准则为前提。吴飞认为，在人工智能介入文化生产活动中，需要有“真实性审查机制”、“算法透明机制”以及“专家责任机制”，

防止技术理性对历史真实造成破坏。而红色文化是具有强烈政治性和历史性的文化，对其进行数字化再生产也应当遵循真实性以及价值导向原则，保证生成内容符合客观史实和社会公共价值要求。

从制度上来说，“政府指导—高校参与”双主体合作模式。地方政府的文化部门提供权威性资料以及相关方向性指导意见，制定红色资源数字化规范并进行内容把关；而高校则负责学术研究、技术支持以及内容制作等工作，实现专业化分工。此外要设立可追溯机制及预警机制，保证来源的真实性、准确性。

还要建立公众参与以及反馈机制，提高传播过程公开性和透明度，在制度上和法律上进行多方面控制，以期打造红色文化数字传播长效机制，在技术进步的同时保持对历史尊重的态度，保证红色文化在网络时代权威性和可信度。

#### 六、创新价值、风险反思与未来发展路径

本论文在方法、技术与应用等方面均有突破，在方法上，把田野调查与AIGC相结合，形成“技术生成与史料校验双管齐下”的研究手段，在传播形式上，采取身临其境的故事讲述方式，使红色文化由单一呈现到生动表现。从实践中总结出一种可借鉴的方法，为当地红色文化的数字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行方案。

但是，AIGC在文化传播方面也存在的问题，在算法生成中可能出现对历史事实的偏差，在视觉重构时如果没有经过认真的核实，会降低历史的真实性，在沉浸式叙事中如果过于注重情感化的表达，又会导致娱乐化的倾向，所以要有一套审核制度以及技术伦理的要求以保证生成的内容真实可靠并且有意义，在此基础之上还要有相关的法规来保护知识产权与信息安全。

在这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我们既要做技术的革新者，用数字手段激活红色基因的生命力；更要成为历史的守护者，确保每次创作都承载着对革命先烈的敬畏，每个像素都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唯有如此，红色文化才能在数字浪潮中避免沦为转瞬即逝的泡沫，真正成为滋养民族精神的不竭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生命力”，这为AIGC赋能红色文化传播提供了根本遵循。

#### 总结

本研究围绕AIGC赋能地方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这一核心议题，在理论分析与田野实践相结合的框架下，系统探讨了技术创新与红色文化传承之间的协同机制。我们通过对江宁区红色文化资源的实地调研与史料整理，构建了“史料整合—智能生成—沉浸表达—传播转化”的实践路径模型，展示了AIGC技术在提升传播效率、增强情感体验与促进观众们的认同方面的现实效能。

研究表明，在当前数字化媒体时代，传统单向传播方式已经不能适应不同人群对于媒介使用习惯以及情感参与要求。而AIGC所带来的多模态叙事、沉浸式体验等可以更好地重现那段历史场景，使人从认知上、情感上乃至行动上都产生共鸣。但是技术赋权并非绝对公正，在其参与到文化生产当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如历史事实扭曲、情感表达娱乐化以及算法偏见等问题。所以，红色文化的数字化重构就需要做到真实性和价值取向，需要有专业人士把关、有数据来源可追溯以及有算法公开制度，保证生成的内容是真实的并且是正确的。

总体来看，本文开展了田野调查与AI智能生成相结合的研究尝试，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个地方红色文化的数字传播模式，对于新时代红色文化的数字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广的研究对象，更大的技术运用空间，在制度和伦理上进行更多的研究工作，使红色文化的传播能够在数字化的时代更加深入持久的发展。

#### 参考文献

- [1] 喻国明. 数字媒介时代的传播范式变革[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2(4): 4-15.
- [2] 彭兰. 智能传播: 算法时代的内容生产与价值重构[J]. 国际新闻界, 2023(2): 6-18.
- [3]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Z]. 2021.
- [4] 李娟. AIGC技术赋能文化传播的伦理边界与实践路径[J]. 现代传播, 2024(1): 123-130.
- [5] 吴飞. 人工智能文化传播的伦理规范与制度构建[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3(5): 120-128.
- [6]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Z]. 2023.